

前　　言

周恩来同志生前指示：“用历史知识来教育人民”。这是我们从事文史工作的宗旨。

在上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共同地努力，《望江县文史资料》第二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上一辑，我们刊载了辛亥革命烈士韩伯棠的事迹，广大读者都为我县有这样的英雄人物而感到自豪。在第二辑里，再向大家介绍我县一位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何世桢，何先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民主革命，是当年法律界的骄子，也是教育界的闻人。因他早年活动在外，乡里鲜知其详，所以，我们特地从上海等方面组织撰写了一批稿件，以飨读者。

在这辑里，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记录了解放前望江教育与新闻界的一些情况，值得称道的是，早在二十年代，我县就出现过一位女子教育的启蒙者——龙蕙芬女士。她用短暂的一生极力倡导并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创办了我县私立维坤女子学校，为我县培育了一批巾帼英才。

本辑一如既往地选载了我县的山形地貌，风俗民情，给未来的探索者们留下蛛丝马迹，还专门编撰了解放前我县工商经济方面的一些资料，对结合实际开拓我县经济事业当不无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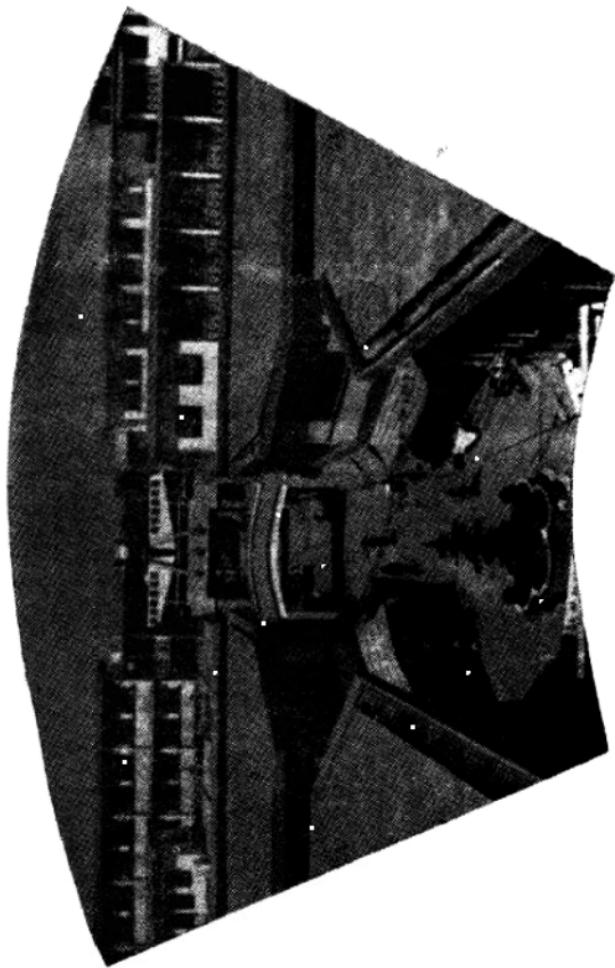
由于我们知识薄，水平低，资料不足，书中定有许多误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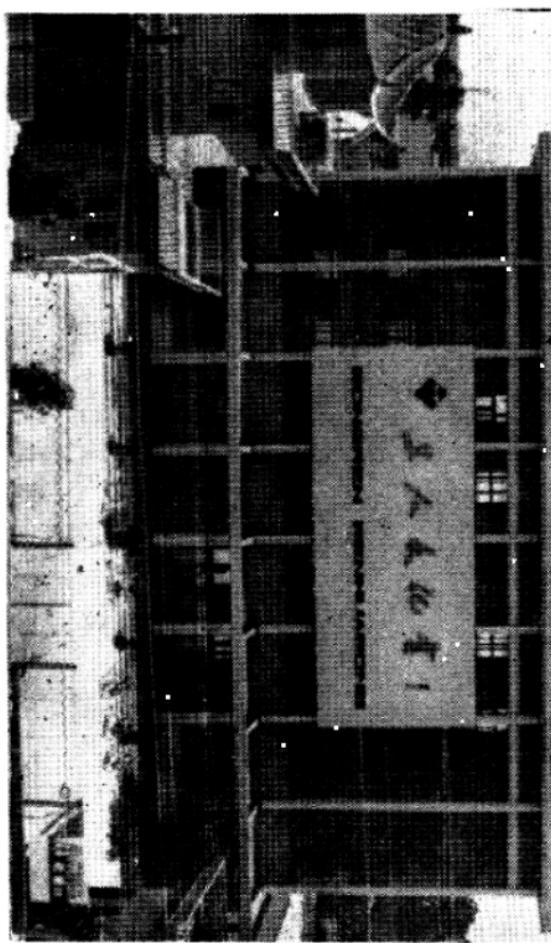
若山水驻，雷水长流。芷江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培育出一代代聪男慧女，俊杰奇才，谱写出一篇篇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我们热忱地期望有志于文史工作的各界人士，开阔视野，深掘细搜，让我县的珍贵史料重放光采，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事业做出自己奉献。

驰

一九八八年三月

繁华宽敞的雷池市场中心





一九八七年落成的望江工人之家

右：孫中山先生手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名單。

下：1924年5月，上海國民黨執行部成立時留影。前排左一為鄒中夏，右一爲向鑑予；後排左二爲毛澤東，右一爲陳代英。當年他們都是共產黨人。

二排右一為何世模先生



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十七人

原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画册

目 录

前 言 驰 (1)



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 何世桢遗作 (1)

何世桢生平介绍 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2)

何世桢先生二、三事

——为纪念何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而作

..... 刘同葆 (15)

何世桢当选国大代表前后 宋树华 (19)

祖父周籁岑和他的《虬庵诗集》 周培德 (21)

袁祖光身世小考 袁怀民 (28)

倪模先生传略 刘道源 (30)

檀萃和他的著作简介 刘富强 (33)

抗日殉难的李强 周乃斌 (37)



望江中学的创建与发展 龙时俊 杨宗藩 (39)

望江坚持灾区教育剪影 孙皖樵 (43)

抗日时期望江沦陷区教育概述 何仲棠 (45)

维坤女子学校与龙蕙芬女士	宋 端	(47)
解放前的望江新闻界	吴 垠	(53)
《 燕尾报 》	焦 桐	(56)
《 望江简报 》	宋树林	(59)

名胜古迹

古雷池考	刘道源	(61)
望江古城历史沿革概述	宋静源	(67)
香茗山散记	王维屏 桐 梓	(83)
迎龙宫拾遗	周乃斌	(91)

史事纪略

合成圩史话	汪竹君	(93)
西圩演变简介	何乐民	(103)
望江县城沦陷记	朱子衡遗作	(107)
国民党政府兵役法在望江实施情况及其失败原因	周治平	(111)
华阳救生局纪略	余晏清	(114)

工商经济

解放前城关工商业概况	宋静源	(117)
------------	-----	---------

◎ 社会轶闻 ◎

《龙氏冤状》

-金联州口述 金定州 叶韶华整理 (123)
武昌湖渔民抗税斗争事略余晏清 (126)
童养媳与等郎媳沈钟英 叶韶华 熊入梦 何仲棠 (129)
旱荒歌汪玉南 余兴汉 (132)
后记与征稿政协望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35)

补白：

- 缅怀六叔何世桢逝世十五周年何祚光 (14)
马井与马坟的传说余晏清 (131)

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

〔何世桢〕

五四时期，我在上海东吴大学法科读书，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由此获与孙中山先生接近，得到他的教诲。那时中山先生的秘书是谢持，常奉孙先生之命与上海学生会的几个领导人联络，其中有程天放（学生会会长）和何葆仁（原学生会会长，因身体不好辞职，由程继任）。我时任学生会评议长，不时与他们同去晋谒孙先生。后来我们先后加入了国民党，但为了工作关系，都不公开暴露身份。

现就我所回忆到的与孙中山先生接触的片段印象，记之如下。

一、中山先生与青年学生

五四运动时，上海全市罢工罢课，在此影响下，上海租界和南市、闸北的商人，也宣告罢市。罢市将一周，孙先生要谢持通知我们去香山路寓所见他。先生对我们说：“你们发动罢市，很好。但是，能发也要能收。”我们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

“罢市已将一星期了，你们知道商人不做生意要有损失吗？如果商人们支持不了，自动开市，那时学生会的威信就大大的减少了，不如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这样，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这时正好北京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不得不下令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我们回去后，开会

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并不说明是中山先生的指示，结果获得通过，就组织学生分头动员开市。北京学生会派了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等来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我在一天晚上陪他们晋谒孙先生，谈得很迟。那时我因白天搞学生会工作，晚上还要温习功课，感到相当疲劳，在他们谈话时，不觉睡着。中山先生发现了，怕我受凉，就去取了一条毯子，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大家看了，都很感动。

有一次，我们为了要发动上海学生募款赈灾，向孙先生报告。孙先生当场批评我们说：“这是社会福利工作，不应该由你们去做。你们青年应该去干革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先生北上经过上海，学生会组织了一批学生去欢迎，他很高兴，鼓励我们要献身革命，说：“你们最好去开一个会，把青年们统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党。”

五四运动期间，孙先生有一次问我们：“你们说，革命党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我答：“为了革命，要不顾自己的生命财产。”先生说：“这还不够。俄国虚无党人为党工作，功则归党，万一被捕，宁可一身承当，决不牵累组织。我们革命党人也应该有功则归党，失败则一身任之的精神！”

一九一八年七月，孙先生因桂系操纵粤局，成立所谓军政府，被迫离粤来沪。一九二〇年一月，正值东吴法科寒假期中，中山先生要我同何葆仁到广州去，带一密函给林森。因为我们是学生，可以减少敌人的注意。当时林森住在照霞楼。在那里，我们曾遇到钮永建、孙科、刘成禺以及国会议员多人，内有后入孙传芳幕的万仞千。

中山先生还指示我们发动学生向七总裁请愿北伐。我们将请愿书递交伍廷芳。他当场劝我们迅即离穗，因为莫荣新已下令逮捕了湖南学生会的两个代表。当由伍朝枢护送我们到沙

面，然后搭夜渡赴香港。

二、陈炯明叛变以后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八月十四日，中山先生抵沪。由于革命不断遭受挫折，党人颓丧者很多。吴稚晖、蔡子民等还曾与胡适、黄炎培等联名通电，促孙下野。中山先生为此曾在香山路寓所草坪上邀集同志讲话，鼓励大家要有信心继续革命。他还发表了个《告同志书》，主要也是这个意思。
（注一）

在此时期，朱执信住在上海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三益里，邵力子、戴季陶、廖仲恺、胡汉民等常去叙谈。孙先生常叫我到那里去接洽事情。据当时一般传说，这时已经在酝酿国民党的改组，此地即为秘密筹备之处。

一次，中山先生同徐谦、孙洪伊等谈话，为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争论甚烈。徐、孙不同意中山先生的分析，当时张秋白亦在，附和徐、孙。

孙洪伊在北方活动，形成独立王国，人称他的一派为“小孙派”；徐谦自恃与冯玉祥的关系，也不听中山先生的话。一天，我接到孙先生电话，说有任务当面交代。当时我在南方大学执教，临时停课赶去。到孙先生寓所时杨春绿已先在，先生就关照我们：“给你们一个任务，对外不许讲。徐季龙（徐谦字）与方振武今天下午要在女子法政学院（该校是徐妻所办，徐妻自任校长）召开所谓爱国会，你们去参加，好好掌握这个会。”我们在事前已接得通知，但不知道它的性质和内容，奉中山先生命后，我们即组织了一些特别区分部的同志去参加（当时我负责该组织）。会议内容现已记不清，似乎是要通过一个决议致电北洋政府为冯玉祥撑腰。我们根据中山先生的指示，

力阻其议，使徐谋不遂。

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中山先生在上海寓所召集会议，宣布要改组国民党，重发党证。（注二）当场指定各部部长人选，其中宣传部长是陈独秀，在宣布时，并无人异议，隔了几天，有人看见《向导》上有一篇批评中山先生打电报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文章，题目似为《孙中山忠孝洋大人》。一些国民党员，尤其是当时住在霞飞路（现淮海路）宝康里、吴兴里的一些人如张继、谢持、施达之、茅祖权、费公侠等，就拿它做文章，攻击陈独秀。中山先生不得已，改任叶楚伦为宣传部长。

一九二三年初某一天，我去孙寓，先生对我说：“吾党党员程度很差，要好好训练一下。”遂招了一些同志经常去寓所听他讲解三民主义。听讲者有孙镜亚、杨春绿、张国元和我等，邵力子间亦参加。讲了大约不到二、三星期，沈鸿英军进驻广州，陈炯明率残部退惠州。粤局既定，先生即于二月十五日南下，讲课也即中断。

行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约一百多人（多数是粤籍）到寓所欢送。中山先生很高兴，当场讲话，主要是鼓励大家革命。那天，先生用粤语讲，要我当记录。其实我不太懂粤语，但不好推辞，勉强记了一些。请先生过目，先生勉励有加，说我还记得不错。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先生率师东征。一次，被陈炯明部包围，形势很危急。适樊钟秀从河南率部间道来粤，得先生被围讯，就亲自率部冲锋。陈部忽见有穿了从未见过的号衣的部队冲来，惊呼：“新兵来了！”遂得解围。中山先生为此很器重樊。我曾听到他在某一公开场合称樊是“我们最革命的军人！”

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方面，先选出十人，再由中山先生圈定三人为代表。三人是叶楚伧、伏彪和我。

大会期间，先生作了多次报告，每次二、三小时，多数是讲形势。那时，我已感到先生有些苍老模样。有一次，他讲：“今后党的事是同志们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大家听了，有突兀之感，因为过去他一向是用“你们要跟我走，听我的话”之类的口气讲话的。（注三）

除了中山先生的报告外，还有海外各地党部的报告。李守常（即李大钊）也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国共合作共同革命。当时，在正式会议中气氛是融洽的，但会外则有斗争。以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为首的右派经常捣乱，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有一天午饭后休息时间内，冯自由和邹鲁打了起来。胡汉民与汪精卫这时还站在邹的一边，与冯争论。这时，大会设党章审查委员会和宣言审查委员会，我任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晚间经常有会，所以对冯等的活动不详，只听说冯等经常在邓泽如家商议。针对右派捣乱，中山先生有一天特要谢持通知一些人于晚上去大本营开会。会上，中山先生就联俄、联共问题讲了很多道理，要大家尽一切力量把会开好。当时，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许崇智等都在座。

大会期中，中山先生曾率全体与会人员谒红花岗、黄花岗烈士墓。

某晚，我与廖仲恺、黄季陆、刘芦隐等宵夜，廖对我们说：“明天大会有重要报告。”翌日大会，孙中山先生宣布：列宁逝世了。随即举行悼念仪式，由鲍罗廷用英语报告了列宁

平生事迹，伍朝枢担任翻译。仪式完毕后，大会休会三天。

大会期间，于右任有一天对中山先生说，希望把上海大学改为党办的学校。孙先生答道：“可以，但要由党派人去办。”于听了，很不高兴，认为中山先生不相信他。过了几天，大本营发出通知，委何世桢为上海大学学长（这是相当于教务长的职务名称，我当时原任上大英文系主任）。于看了大笑说：“原来是这样，先生何以不早说！”

国民党改组后，就在上海、汉口等地建立执行部，进行党务工作。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现南昌路）四十四号。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执行部青年部任秘书，部长是叶楚伦。有一天，青年部的一个干事张廷灏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份中共出版的团刊，给我和叶楚伦看。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共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叶拿给张继、谢持等 人看，他们很为不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一个“弹劾案”，实际是反对国共合作。后经中山先生把此事平息下去。（注四）那时我也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论点，曾同恽代英（时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展开辩论。恽批评我说：“你不要以为喝过洋墨水，其实你对马克思学说什么都不懂。我们也不必再争论，还是好好看看《资本论》吧！”

一九二四年夏，中山先生在穗，通知上海执行部利用暑期，吸收上海各校与国民党接近的学生代表，办一个暑期讲习班。执行部在法租界借到一个学校，组织了不定期讲课。参加听讲者每次不等，一般在五、六十人左右；担任讲课的有恽代英、邵力子等。中山先生在事先给了我一本英文本的《瑞士政府》，要我看了讲其中关于创制权和复决权的问题。讲稿悉由《民国日报》陆续发表。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起。中山先生曾电上海执行部尽

量支持卢永祥。执行部奉命后，曾派余立奎带了几百人到浏河前线参战，还动员牛惠霖医生为卢军救护伤病员。记得李征五为了此事白天到执行部，晚上去《民国日报》馆听消息。当时，陈独秀反对中山先生联合段、张，不赞成支援卢永祥，说：“革命要彻底，我们对任何军阀都反对。”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山先生北上路过上海，有一次同我们谈话，在坐者有戴季陶、杨庶堪、孙科等。他说：“我们要学日本文部省的办法做三件事，一是设一个翻译国外新书的机构，日本文部省下面有这样一个机构，外国新书不出三个月就翻译出来了；二是要办报；三是要办学校。我们应该先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办一个大学，然后次第附设第一、第二、第三……中学。”说到这里，他转而鼓励我好好办学。

这次北上，中山先生先去日本，再换船赴天津。在日本时，他作过多次演讲，主旨都是宣传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他路过上海时，曾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看日本现在分三派，一派支持张作霖，一派支持段祺瑞，还有一派支持国民党，表面上似乎各走各的，实际上他们内部是统一的，对中国都是不怀好意。譬如赌钱下注子，哪一方得势，他都赢。所以我此去一定要好好地对他们讲，这样是不会使两国关系变好的。”

四、中山先生的好学求知精神

孙中山先生为了研究平均地权学说，曾阅读了德国人在青岛所实施的土地公有办法，认为私人可以租赁使用不好，又请了两个日本顾问（名字已忘），亦未有成果。为此，他致函些党员，说他自己研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还未找到有效办法，要求大家多多研究这个问题。

中山先生好读书，一九二二年底某一天，他看到报上登载一则美籍律师佑尼干在沪逝世，由美领署代为拍卖其藏书的消息，便叫我向美领署要了份目录来。先生阅后，说很好，要全部收购。我就同美国副领事金氏商量不再拍卖，由中山先生通知林焕庭作价买了下来。

这批图书送到寓所后，不到三个月，中山先生即去广州。我去为他整理这批图书，想不到很多书上都已有中山先生的批注的手迹，足证先生读书之勤。前述先生要我看的《瑞士政府》，就是其中的一本。

五、其他一些回忆片断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各地停兑，惟上海分行仍继续兑付。该行商股股东在沪酝酿组织了一个“大清银行股东联合办公处”，提出把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主张。这个办公处的主任是我的大哥何世模，副主任是吴鼎昌。在孙先生抵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们曾为此事晋谒，中山先生表示支持，并要求该行募集公债四百万元，以济革命之用。大清银行旋即改组为中国银行。

上海法租界捕房督察长程子卿，很早就同中山先生有关系，详情不明，惟知程初非国民党人。他因职务便利，遇有不利于党人的消息，辄“放龙”（通知）给党人，使之及早准备应付。

我与程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后中山先生北来的时候。为了保护孙先生来沪后的安全，我代表上海党人与法领事交涉，法领事指定一个在法捕房工作的法国人沙利负责承办。此人只能讲法文，我又不会法语，居中联系的即程子卿。